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王都坂乡村演变研究

俞晓华¹,林威呈²

(1. 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5001;2.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 365001)

摘 要:以自组织理论为切入点,从王都坂的建制沿革、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等相关概况入手研究其发展历程,探索其乡村系统的自组织特征、内部发展动力及序参量,分析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王都坂乡村社区营造的项目规划以及主要策略,为当地的社区营造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乡村;自组织;历史演变;动力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志码:**A

长久以来,乡村的发展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从乡村的系统开始着手研究乡村,探讨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从更深的层次理解乡村。在社会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人为秩序观和自发秩序观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自发秩序观认为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演化,有着一定的自然规律可循,通过其系统内部的运动形成一定的秩序。社会秩序的自发形成还是社会系统中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相互适应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自组织现象。自组织是自然界各个子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效利用当地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方法和道路。而在人类社会,人们在探索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他组织演化方式^[1]。

已有研究表明应用自组织理论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成果可以对社会发展系统的现象、问题和管理等进行描述和分析并且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的对策和方法。而乡村社会是社会发展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运用自组织

理论对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十分必要。高春风在《自组织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发展研究》一书中,针对乡村系统内的就业竞争、农产品生产竞争与协同开展了研究,发现促进乡村发展的序参量是村民的满足度^[2]。大多数村民的满足度有力地控制着乡村发展的秩序,乡村内部的一切行动都应该是围绕着村民不断增长的内部需求展开的。此外,自组织理论还运用于乡土建筑的自发性建造以及乡土聚落或民居的发展保护研究,例如乡土建筑的自发性建造^[3]、西北地区土地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分析^[4]、历史文化名城阆中自组织演进^[5]、东北满族传统民居保护与发展^[6]等。

王都坂是当代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基于自组织理论研究王都坂,为全面了解王都坂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基于此,笔者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梳理王都坂的发展过程,揭示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系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规律,探讨其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和主要序参量,明确未来乡村社区营造

中继承和发展的对象,推进王都坂乡村发展以及可持续营造。

一、自组织理论及其相关概念

1967年,耗散结构理论被正式提出。耗散结构理论成为自组织理论的重要分支。耗散结构是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根据耗散结构理论的定义,自组织系统具有开放性和非平衡性^[6-7]。1971年,协同学思想和主要概念被正式提出^[8]。协同学认为,一个复杂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制约与协作的关系,各子系统以某种特定方式进行协同作用可以使系统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据此,产生自组织的条件有3种:其一是外界环境对系统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会由旧结构向新结构转变,重新进行自组织;其二是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变化会引起自组织;其三是控制参量的突变引起的自组织。这3种自组织方式往往会互相交织,定义着系统的整个自组织过程^[8]。

协同学解释了系统自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主要研究系统的内部发展动力、序参量等^[9]。系统的内部发展动力来源于各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竞争主要指各子系统为取得主导地位而相互制约的活动过程。协同则是指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作、达到系统内部统一的联合过程^[10]。在系统演化过程中,竞争与协同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共同形成系统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序参量是各子系统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序参量的成因主要来源于系统内部。当系统环境发生改变时,其内部参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王都坂的相关概况

1. 建制沿革

王都坂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西北部的山区,四面环山,全村面积约6.7 km²。自古以来,王都坂隶属云霄县下河乡内龙村。根据《云霄县志》的记载,清嘉庆元年(1796年)以前,下河乡隶属平和县。清嘉庆元年,巡抚姚莹以云霄为漳浦、平和、诏安三县要

冲,奏请划平和县二十五保、诏安县六保并云霄县三十保置抚民厅。清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复准,即由平和县将下河、上河、十二牌(后坑埔、下洞)、孙坑、龙坑(外龙、内龙)划入云霄,内龙属于龙坑保。

直至民国二年(1913年),漳州建立云霄县,当时的保甲区划如故,即内龙村依然属于龙坑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内龙村属于龙河乡管辖。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内龙村隶属吉龙乡管辖。

1949年以后,下河乡为第四区,内龙村由其管辖。1958年8月,云霄县撤区建人民公社,下河区成为跃进公社,内龙村隶属于该公社。1960年,内龙村改称“内龙大队”。1961年1月,跃进公社改称下河公社,内龙村仍由其管辖。1984年,云霄县实行乡镇建制,下河公社改称下河乡。1985年,“内龙大队”改称“内龙村”,隶属下河乡至今。期间,王都坂一直隶属于内龙村。

2. 自然环境

王都坂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南高北低,濒临龙兴溪,地形起伏变化较小。村内山体多为火山岩,厚度巨大。村东面为尖峰山,西面为石刀山,南面为后壁尾山,北面为凤堆山。村落东面、西面、北面皆为龙兴溪环绕(见图1)。



图1 王都坂的自然环境

3. 王都坂的时代发展历程

王都坂的历史发展悠久,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的改革,王都坂的乡村社会生活形式及其空间格局也在不断演变。笔者将其历史发展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小农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

王都坂在小农经济时期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至清乾隆初年;第二阶段为清乾隆初年至1949 年。计划经济时期从 20 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农村改革开放前夕。市场经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6 年底;第二阶段为 1997 年至今。

三、王都坂乡村的自组织解析

1. 王都坂的自组织特性

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系统源于其开放性和

非平衡性。当地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是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这一系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使王都坂乡村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不断地进行竞争与协同,从而使王都坂一步步地走向有序。

(1) 王都坂乡村开放性特征的时代演变。王都坂从自由生长—形成核心—开放性演变的过程如图 2 所示,随着各个时期物质、文化、人口的发展,王都坂逐步具备了自组织系统形成所需的开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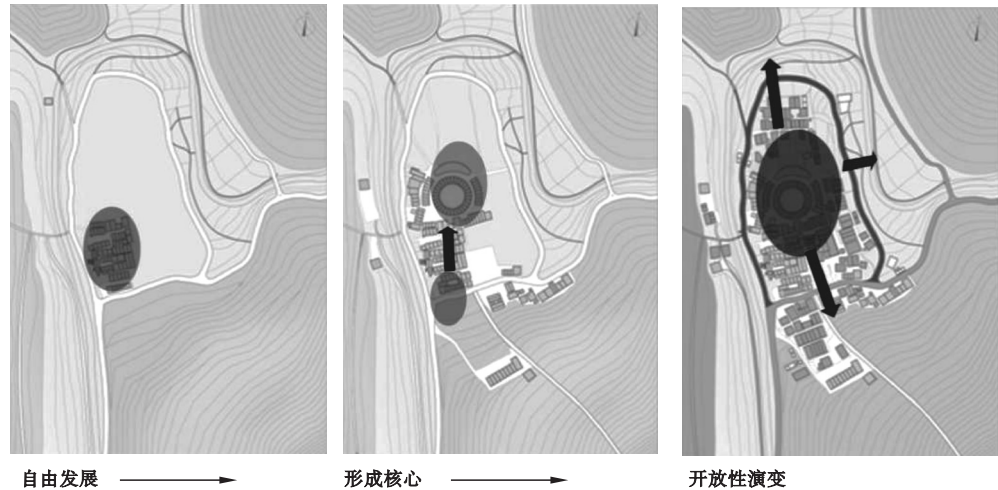


图2 王都坂的开放性演变

①小农经济时期。小农经济时期王都坂形态分布如图 3 所示。这一时期王都坂承担着当地村民所需的生产、生活等几乎所有社会活动与社会功能,封闭性较强,开放性差,其发展主要依靠当地村民的血缘关系及地缘关系。由于地处偏僻,外界的建造技术一直难以传入王都坂。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是当地建设活动的主导思想。当地所有的建筑都是就地取材建成。明洪武二十三年至清乾隆初年,王都坂的建筑主要集中于现今“祖厝—陶淑楼”轴线的西边,建筑呈行列式分布,主要是单元式夯土住宅。清乾隆初年—1949 年期间,由于林氏宗族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他们于清乾隆初年在王都坂的中心建成了陶淑楼和林氏祖厝,形成了如今的“祖厝—陶淑楼”轴线。在很长时间内王都坂都保持了这个平面形式。

②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分布如图 4 所示。这一时期王都坂显现了一定的开放性,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开始向北边的山体扩张,乡村社会受到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在居住方面,人们的居所一般位于集体组织的所在地;在生产活动方面,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排当地的产业结构、房屋的建造活动以及村落空间的使用。由图 4 可见,烤烟房开始分布到西边的农田,北边的山体也开始用于建造住宅。山地植被从 1974 年开始被砍伐并开发为生产队的果业农场。村民在溪流里堆积的垃圾逐渐增多。山上的果林也被大量砍伐,改种桉树,山体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当地自然景观开始遭受破坏。

③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分布如图 5 所示。这一时期村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增加,乡村原有社会结构出现

了分化和转型,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成员的的职业分化。王都坂大量的村民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只在节假日或家庭需要时返乡,而以务农为主的家庭仍然留守乡村。2004 年,政府完成了王都坂与外村之间道路的硬化工作,村民外出更为方便。由于大量村民外出,王都坂与外界的联系大大增强,其乡村自组

织系统的开放性得到加强。这一时期外界社会的信息、技术、文化大量涌入乡村,使得乡村的面貌产生了较大的改变。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条件逐渐好转,陶淑楼的东边和北边的空地也开始被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如今,王都坂环村路内的空地绝大多数都被占用以建造村民住宅。



图 3 小农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分布



图 4 计划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分布



图 5 市场经济时期王都坂的形态分布

在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王都坂与外界的交流一直较少。直至市场经济时期,村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增加,但王都坂大多数村民的人际关系圈都局限于村内。即使修了道路,王都坂的外来人口依然较少,外界环境对其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虽然王都坂具备了自组织系统形成所需的开放性,但是由于王都坂偏僻的地理位置,外界人口、文化、物质的输入对其产生的影响较弱,王都坂内部自组织的影响大于外部参量对其的影响。

(2) 王都坂非平衡特征的时代演变。王都坂建筑空间发展的非平衡性演变如图 6 所

示。从建筑空间需求单方面来看,王都坂的非平衡性首先体现在村民对外界资源的获取途径和对建筑空间特色、多样性风格的需求。计划经济时期以前,由于村民的建造活动受到较多限制,建筑形式没有明显的变化。直到市场经济时期,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开始将外界的建造技术引进王都坂,才出现了大量的条石建筑以及后来的砖混结构建筑,并出现了一部分建筑装饰。这意味着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拥有更多接触外界资源的可能,他们在资源的获取方面占优势地位。因此,王都坂系统内部产生的竞争和协同,也正是王都坂乡村内部的非平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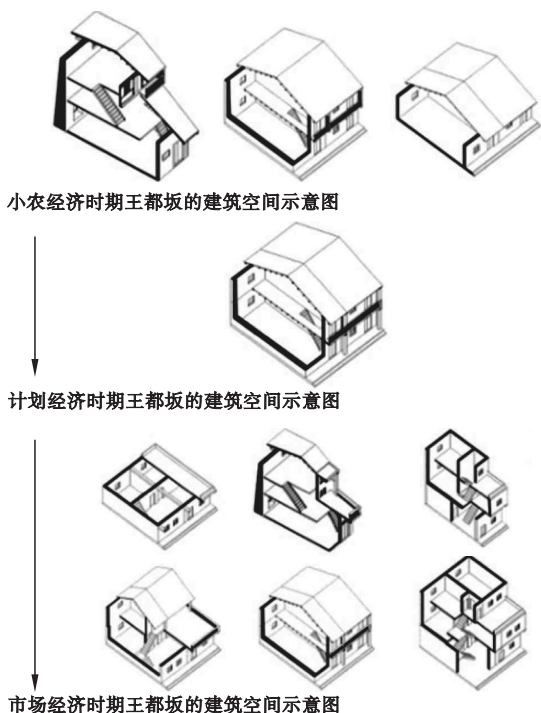


图6 王都坂建筑空间发展的非平衡性演变

①小农经济时期。由于地处偏僻,外界的建造技术一直难以传入王都坂,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平衡性和单一性。这一时期主要的建筑材料是夯土、碎石块和木材,主流的建筑承重结构分为夯土墙承重、乱石墙承重两类。门窗也主要以木制门窗为主。当地的建筑装饰主要集中在村里的标志性建筑——祖厝上,住宅基本没有建筑装饰。

②计划经济时期。这一阶段人们没有择地而居的自由,只能在原址翻建或者在一些空地上建造新房。夯土建筑沿用早期原始的建筑类型和传统的细部做法。建筑材料除了使用土、石、木材外,还增加了烟炙砖。烟炙砖主要用来砌筑柱子和门窗框。当地还有许多尚未拆除的夯土住宅留存。

③市场经济时期。王都坂显示了建筑工艺、材料、技术的非平衡性和多样性。由于村民大量外出以及乡村经济的发展,外界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材料开始进入王都坂。村民开始大量使用条石砌筑住宅。夯土建造工艺开始受到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前,王都坂的条石建筑一般是两层楼,较好地传承了闽南民居的传统形式。户主还基于当时的实际

需求对传统的建筑形式进行调整,建筑的装饰也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没有墨守成规。这些建筑较多使用铁艺、砖砌和少量石雕作为建筑装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当地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王都坂的农民自建住宅数量继续增加。1990年以后的条石建筑大多数是一层楼的单元式住宅或独立住宅。这个时期的条石建筑一般是矩形平面,内部空间的划分没有较大的突破。传统的建造工艺持续没落,传统的细部做法逐渐被淘汰,仅有少量住宅使用烟炙砖砌筑门窗洞。由于外界建筑文化的影响以及施工技术的发展,21世纪初,村里开始出现砖混结构及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住宅。砖混结构的住宅有很大一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单层条石建筑的基础上加建的。新建的砖混结构住宅脱离传统建材,建筑外表都以瓷砖贴面或水泥抹面为主,不锈钢栏杆和推拉窗也走进了家家户户。这个时期建筑内部的厨房、卫生间、卧室等功能的空间分割开始明朗化。传统的建筑装饰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建筑里几乎彻底消失。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经济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失衡是王都坂的有序之源。如果一个系统是平衡的,就无法产生竞争和协同,进而难以发展。小农经济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王都坂乡村形态发展缓慢正是因为当地村民之间未出现分化。王都坂乡村内部的非平衡性,正是其乡村系统自组织的最大动力来源。

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来看,王都坂的非平衡性更着重体现在人口、经济、文化等要素在不同方面对乡村系统的作用。笔者从王都坂村民职业分化、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来剖析当地乡村系统的非平衡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村民职业分化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村民的职业类型主要分为务农、务工、经商、医生4种。王都坂是特色种植的专业村。王都坂农业专业化的形成也是其内部村民职业高度分化的表现。尽管在乡村内部不能表现出职业多样化,但专业化为王都坂争取更大范围内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工创造了条件。村民

依靠大规模的果树种植发展了水果销售、水果罐头、养蜂等副业。由于改革开放,社会上增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和经商的可能性,许多村民开始走出村子,在外务工经商。

王都坂常住村民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调查以及村民年龄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大多数村民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小学。村民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其对外界技术和信息的接受程度。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往往会使部分村民较快地掌握各种技术,导致村民之间出现差异。这也有助于自组织的形成。因为村民之间可以互相交流,部分村民可以将技术传授给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这个过程中掌握各种技术的村民成为乡村的核心,通过其在乡村内部的关系,不断关联放大,将相应的技术传播给其他村民。同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能导致村民的需求出现差异。不同村民通过外部环境实现内在的需要,这也为自组织提供了行为依据。基于不同的需求,便会有社会流动行为的出现,这是形成自组织的社会心理基础。

社会地位即村民在乡村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乡村中,各家一般都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村民或者家庭对当地社会起的作用就会有差异。在乡村,往往是拥有特别名望、身份、地位、品质以及比一般人拥有更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村民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拥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交流机会,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更容易影响其他村民,进而使自己处于某一关系网络的中心。在王都坂,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村民往往是当地的乡贤、人缘较好的村民、掌握一定实用技术或者具备一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的村民。这些村民的经历和社会角色使他们具有较多人际交往的机会,他们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应用和传播经验,而且逐渐建立起在当地群体中的威信。

总之,这一系列的不平衡,反而令王都坂乡村系统的发展成为可能。只有保证这些不平衡的存在,王都坂才能形成有序的结构,并

保证足够的活力。

2. 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

王都坂乡村自组织的内部发展动力主要源自村民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协同,这里主要包括村民的就业、子女受教育条件等。协同则是这些竞争后期自组织演化的一个表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外界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大量的村民开始离开王都坂,在县城或周边的城市工作,以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在不同的就业机遇下,王都坂居民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王都坂的劳动力由于年龄、性别、体质以及个人技能的多层次和多类型而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年龄大的往往留守村里,管理农业或者在村里务工;较为年轻的劳动力一般选择外出务工。这是村民就业方式竞争后的一种自然协同。笔者在王都坂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当地有140户人家,共740人;常住家庭有74户,共231人。将王都坂的常住人口按照年龄层次进行分类,分为老年人口(60周岁以上)、中年人口(45~59周岁)、青年人口(18~44周岁)、少年人口(10~17周岁)、幼年人口(10周岁以下)5个年龄层次,其中,老年人口31人,中年人口120人,青年人口54人,少年人口7人,幼年人口12人。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王都坂的常住人口中,青年和少年所占比例较低。当地人口流失严重。平日在村里劳作的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或妇女。由于已经有部分村民在外界打好了工作基础,会带动当地大量村民外出务工,这使自然协同的效果变得微弱,许多村民会借助亲戚朋友的帮助,突破自身条件的限制,离开王都坂。由于大量的村民外出工作,王都坂原本的农业经济氛围和环境被破坏。

当前,大量的村民为了孩子能够接触更好的教育环境,选择把孩子送出王都坂,在镇上或县城学校接受教育。王都坂唯一的教育机构就是位于祖厝前广场边的内龙小学,2016—2017学年,内龙小学只有二年级和三年级两个年段的学生,一共9人。两个年段的学生于一个教室内一起上课。通过对居民

的走访,发现也有部分村民担心外出工作繁忙,难以照顾孩子的学习,便选择让孩子留在村里接受教育。这也是村民子女受教育方式竞争后的一种自然协同。但是这种协同的作用同样是微弱的,只有少数的村民会选择让子女留在当地接受教育。

据2016年王都坂常住村民的人工比例和行业收入调查结果,2016年王都坂的人均收入为4 801元。其中,种植业的人均收入为645元,占人均纯收入比例的13.44%;养殖业的人均收入为1 415元,占人均纯收入比例的29.47%;外出务工的人均收入为2 741元,占人均纯收入比例的57.09%。由收入的数据对比可以得出,当地目前的主要收入已经向劳务输出倾斜,这也导致了王都坂与外界信息有着更加频繁的交换。乡村是农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要有保证生存的经济活动。不同的乡村根据自然环境和各种社会因素都会有相应的经济活动以维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王都坂当前的经济活动分为种植业、养殖业以及部分村民外出务工这3种。由于当地的土壤略带沙性,所以种植业以果树种植为主,主要是金枣、杨桃、枇杷等水果,同时以此发展出水果销售、水果罐头等副业。养殖业分为牲畜养殖、牛蛙养殖和蜜蜂养殖。大多数村民平时主要的收入来源一般是务工。

3. 王都坂乡村自组织发展的主要序参量

在乡村系统中,当地社会、经济活动、文化习俗等序参量是决定系统自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11]。它们的演变,是乡村自组织发展的关键。

(1) 社会活动。在历史上,小农经济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当地的村民职业主要是务农。笔者对王都坂常住村民的职业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常住村民的职业类型主要分为务农、务工、经商、医生这4种。在常住的74户村民里,经商的村民只有4户,医生只有3户,其余大多数村民都以务农和务工为主。王都坂是特色种植的专业村。虽然村里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工作,但是留守当地的村民大多数从事果树种植业,只有农

闲时在村里或者外出打工。王都坂农业专业化的形成也是其内部村民职业高度分化的表现。同时,村民依靠大规模的果树种植发展了水果销售、水果罐头、养蜂等副业。由于桉树林的经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商家开始雇佣村民从事桉树林的栽培、砍伐、除草等工作。受教育程度决定了村民拥有的学习能力,部分村民通过学习果树培育种植的相关技术,较早开始从事果树种植,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收益。这就导致村民之间出现差异,有助于自组织的形成。村民之间互相交流,较早掌握果树种植技术的村民开始将技术传授给其他村民,使得王都坂逐渐成为以果树种植为主要产业的乡村。

(2) 经济活动。长期以来,王都坂的产业结构较为简单,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当地土地资源丰富,适合种植业的发展。而后养殖业和外出务工日益增加,到2014年,已占重要比例。王都坂的主要经济活动经历了4个时期的变化:

①以水稻为主的种植阶段(1958年之前)。这一时期,王都坂仍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时期,种植当地的传统农作物水稻为主要收入来源,部分村民为了增加收入选择在农闲时务工。

②以水稻、金枣、菠萝和烟草为主的种植阶段(1958—1980年)。这一时期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除了延续传统水稻种植和金枣外,这个时期还引进了烟草的种植,同时,王都坂还形成了烟草烘焙产业。1980年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当地落实后,当地的烟草种植即告消失,烟草烘焙产业也随之消亡。村里至今还保留有当年用于烟草烘焙的夯土烤烟房。1974年,在当地村委书记的组织下,尖峰山和后壁尾山被开垦为王都坂的果业农场,果业农场以种植菠萝、茶叶为主。

③以水稻和金枣为主的种植阶段(1980—2001年)。1980年王都坂落实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当地的农业又恢复了1958年之前以水稻和金枣为主的种植阶段。1985年,果业农场被分为村民的责任田,村民开始

在山地自行种植果树,如龙眼、荔枝等。

④以果树和桉树为主的种植阶段(2001年至今)。由于水资源短缺、鼠害严重,王都坂逐年减少了水稻的种植量。2001年起,当地的农业完全转型为果树种植,除了传统的金枣,还有枇杷、杨桃、青枣等。同年,由于山地被马来西亚开发商承包,原有的果林被清除并改种桉树。

(3)文化习俗。王都坂仍然保留了当地传统的祭祀活动,以求保证乡村的凝聚力。乡贤每年都会召集全体村民参加当地重要的民俗活动。王都坂居民最重要的信仰是“三山国王”^[10]。王都坂的“三山国王”崇拜习俗,源于客家的守护神——“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宗教信仰,发源于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主要是粤东及台湾省民众所奉的守护神,并广泛流传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地缘因素,王都坂村民的信仰自然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三山国王”文化,是对有功于民的先哲的崇敬与期盼。每年,王都坂的居民都会举行祭祀“三山国王”的活动,以求平安,主要有每年正月初六的“走王”(见图7)、隔年正月初七的“走水缸”(见图8)以及年底的“年尾福”这3类活动。



图7 “走王”

活动从当天子时开始,一共分为两场:第一场为拜天地,在子时举行,村里各家各户都会在祖厝前的空地,面朝东边摆齐自家的祭祀贡品,由乡贤主持祭拜天地(见图9)。当晚,祖厝前祈福声此起彼伏,烛光映天,仪式感极为神圣。第二场为拜“三山国王”,于当天的巳时举行。乡贤们于当天寅时从邻村的



图8 “走水缸”



图9 年尾福子时拜天地

龙兴庙请来“三山国王”神像,置于祖厝门前接受村民的祭拜。村里各户在祖厝前的空地,面朝祖厝摆齐自家的祭祀贡品,并由乡贤主持祭拜“三山国王”(见图10)。祭拜结束后,村民依次上前向“三山国王”神像进香,直至仪式结束。



图10 年尾福巳时拜“三山国王”

乡村内部任何活动都是以村民为主的。村民因素包括村民人口、职业、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经济活动主要用于维持当地人们的生存发展。在自然环境和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各个乡村都会有相应的经济活动。文化习俗是人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慢慢形

成的。文化习俗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王都坂地理位置偏远,在市场经济时期依旧发展缓慢,大量的青年人外出务工,近半住户因外出讨生活而搬离乡村。王都坂成为常住人口以老弱妇孺为主、农业经济萧条的乡村。同时其乡土文化也面临着传承危机。王都坂需要有合理的外力介入,激发其系统内部的活力,重塑当地基核,充分调动当地的资源,形成有序的结构。“好厝边计划”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在王都坂开展社区营造工作。

四、结 语

王都坂是当代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通过对王都坂时代演进过程的剖析,发现当地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自组织为主的,外部参量也有一定影响。王都坂乡村现状中存在乡村自组织系统开放性不足、村民个体间就业竞争失衡、乡村农业经济凋敝等问题。王都坂未来的乡村发展应充分尊重其自组织的特性,关注当地的社会发展、乡土文化保育、农业经济发展等问题,重新树立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参考文献:

[1] 叶蔓,王要武.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资源型城市发展策略[J]. 低温建筑技术,2009(4):115-117.

[2] 高春风. 自组织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3] 王冬. 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及其相关思考[J]. 新建筑,2008(4):12-19.

[4] 吕彩云,陈宾. 城市化趋势下西北地区土地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2012(12):38-42.

[5] 何跃,马素伟. 城市自组织演化及其根本动力研究:以古城阆中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1(4):6-9.

[6] 姜欢笑. 自组织美学情境下的东北满族传统民居保护与发展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

[7] 周锦兰. 二十世纪著名科学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简介[J]. 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1):60-63.

[8] 李太杰,李汉铃. 自组织理论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J]. 中国软科学,1999(12):114-116.

[9] 刘辉,张吉礼,孙德兴. 规则双阶段提取自组织模糊控制方法[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5(9):1189-1191.

[10] 朱莹,张向宁. 演进的“乡土”: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传统乡土聚落空间更新设计研究[J]. 建筑与文化,2016(3):108-110.

Study on Evolution of Wang Duban Village Based on Self – Organization Theory

YU Xiaojian¹, LIN Weicheng²

(1.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5001,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5001, China)

Abstract: As an entry point, the self – organization theory is applie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Duban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Self –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ternal development power, and order parameters of the rural system are investigated to analyze the lo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system. The project planning and main strategy of Wang Duban villag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oc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village; self – organ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power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